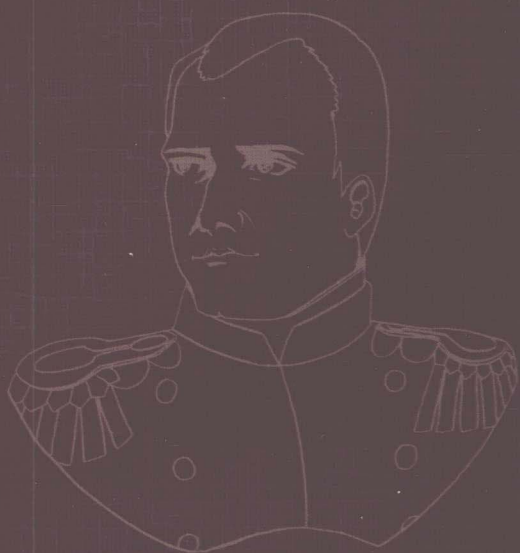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大传



文化百科丛书

陈中梅 主编



三

上海出版社

世界名人大传



文化百科丛书

主编 陈中梅

辽海出版社



尼 采

——20 世纪哲学世匠之首 （德国 1844~1900）

求学生涯路

弗里德里希·尼采 1844 年 10 月 15 日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的洛肯村。父亲卡尔·尼采是一个路德教的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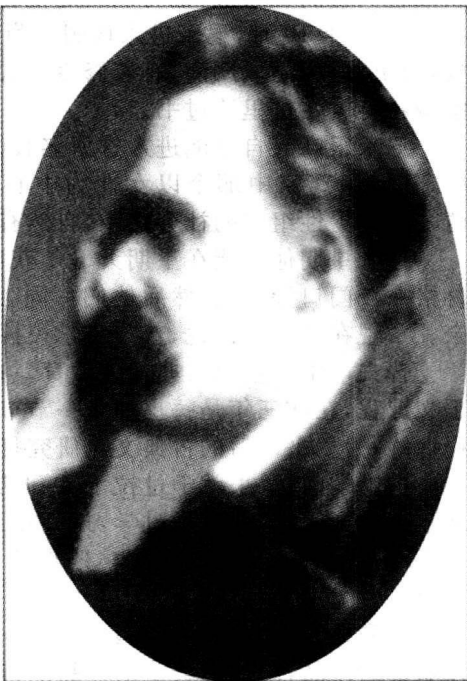
卡尔的父亲也是一个神职人员，曾担任教区监督，勤勉尽职。为消除法国大革命、康德哲学和无神论带给宗教的不良影响，他写过不少东西来安抚和教诲信徒们。如果他老人家得知自己的孙子成了天下第一的反基督主义者，一定无颜在上帝的天国那里安息下来。

卡尔曾当过阿尔滕宫廷四位公主的家庭教师，他的牧师教职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恩准的。由于身体不好，常有头痛症状和神经质，他要求到一个乡村任职，于是来到洛肯。这里偏僻而贫穷，但他喜欢这地方，喜欢过一种安静的与世无争的生活。

小尼采是卡尔的第一个孩子。这时牧师先生已经年过 30 岁了，中年得子，乃人生一大喜事。更让他高兴的是，孩子竟生在国王诞辰这一天，这真让一向性格沉稳、不苟言笑的牧师欣喜若狂。他以国王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为孩子命名，并在教区登记册上写下他此时激动的心情：“啊！十月，神圣的十月！总是让我沉浸在欢乐之中！在所有这些欢乐中，最深沉、最美好的莫过于我为我的第一个孩子作洗礼。我的孩子——弗里德里希·威廉，这将是你的名字，以纪念与你同日出生的高贵的国王恩主！”

尼采的父亲是一个文弱可亲的人，在教民中很得人心，可惜体质虚弱，天生多病，他出生于轰轰烈烈的拿破仑战争席卷欧洲的 1813 年，在 1848 年风云再起的革命浪潮中患脑软病，不久死去，遗下高堂老母与一双儿女。

新寡的母亲披上了黑衣，带着尼采和小他两岁的妹妹伊丽莎白，靠着每年不到两百马克



的抚恤金供养全家人的生活，祖母和两个姑姑也与他们住在一起。六口人中，五岁的小男孩从此成了家中唯一的男丁，因而自小即有与众不同之感，父亲更在女人们的描述中变成一尊男性的偶像。

不久，祖母决定迁往附近的小城瑙姆堡，但那里的人群和声响令尼采不适。遗传自父亲一方的虚弱体质暗示着不祥的预兆，他眼睛近视，头痛症不时发作，母亲想尽千方百计给他治疗，常常带他到安静的草地树林去散步放松。孤独而自尊、静默而内蕴，小小年纪的尼采已经注定与人群的喧嚣无缘。

在女人飘摇的衣袂和轻柔的细语中尼采渐渐长大，体弱而聪慧，由母亲教他读书，罗莎丽姑姑给他上宗教课。虔诚的女人们把宁静生活中所有的期盼都寄托在尼采身上，疼爱而不娇纵，在把知识、信仰灌输给他的同时，也把善良、深沉传给了他。

六岁那年，尼采到镇上的一间私立学校念书。谁能想像得到一个来自柔弱虔诚的女性家庭的男孩子，为了要适应喧闹顽皮的同龄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当这些又脏又闹的小淘气们忙于爬树捉鸟、斗殴说谎时，尼采更愿意独自一人去读圣经，或者激情满怀地朗诵其中庄严的篇章给大人听。但不管怎么说，尼采在学校里还是交了两个好朋友，其中一位在几年后的自传中把尼采描写为一个忧郁早熟的孩子，喜欢独处深思，常常沉溺于自己发明的游戏，思考一些与年龄不相宜的严肃问题。

生活在平静地流淌着，似乎没有什么波澜，不过仍有一些事件发生。1855年夏，姑姑奥古斯特因肺病去世。第二年，76岁的祖母也去世了，她在遗嘱中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尼采和妹妹伊丽莎白。家里又少了两口人，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一个公寓里住。

时间过得飞快，1858年暑假到了，尼采已经读完小学，即将度过他的14岁生日，要成为一个大孩子了。这个假期他还跟往常一样，同妹妹到乡下外祖父母家。这个村子就在萨勒河旁，每天早晨他都到河里洗澡，清冽的河水让他有说不出的畅快，可以减轻头痛病和眼疾，也可以满足他喜好洁净的习惯。

1858年10月，尼采进入瑙姆堡附近的普夫塔文科中学学习。这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历史悠久，学风严谨，有着修道院式的规章制度。学校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大哲学家费希特就在这里读过书。

尼采很高兴自己能进入这所名校。不过这里要求住宿，从此他就主要生活在学校，开始脱离家中那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环境。新到乍来，学校要求严格，又处在由清一色的男性组成的社会之中，自然有一种不适应。

每个星期他只能在星期天下午获准外出，母亲、妹妹和小学的两个朋友宾德、克鲁格在校门口等着他，然后他们一同去附近的小饭馆。这情景真有点类似在军营探亲。拿现在时髦的话说，普夫塔学校搞的是封闭式教学。

普夫塔中学重视古典文化教育。在六年时间里，每星期都有六节希腊文课程；拉丁文课程，在前三年是每星期十一节，后三年是每星期十节。这样分量大而扎实的课程训练，为尼采以后的古典文化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进中学前，尼采就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开始他感到困难，特别是希腊文，后来逐渐克服了困难，并且通过学习，开始对荷马产生兴趣。根据荷马的史诗，他还和朋友宾德合写过一个小剧“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由他和宾德、克鲁格扮演其中的主角。

尼采在宾德家常常见到宾德的父亲，这是一个很有文学修养的人。他向尼采推荐歌德的作品，向他讲解德语作品的诗韵之美。从这时起，尼采对歌德的喜爱和尊崇

就再也没有改变。

尼采也接触到了歌德的作品，初次领略到了德国诗歌之美。另一样新宠则是音乐，尼采欣赏到了门德尔松和贝多芬的杰作，母亲特地为他买了一架钢琴，请当地最好的一名女琴师向他教授演奏。因此，尼采进入瑙姆堡附近知名的古典主义教育中心普福塔中学时，14岁的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古典文学与音乐素养，这所学校因培养过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诺瓦利斯、梵文研究专家及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家施莱格尔和哲学家费希特而名噪一时。尼采在六年学习期间如鱼得水，奠定了以后作为古典语言学者和诗化哲学家的基础。

然而，疾病与死亡一直在威胁着这个家庭，祖母和奥古斯塔姑姑先后去世，尼采本人又困于眼疾、头痛。在生之困顿的压抑之中，勃发的青春活力使本性温良的尼采竟然屡屡爆发出叛逆之举，他像粗鲁的水手一样畅饮烈酒，整夜不睡，用拉丁文撰写和誊抄冗长的论文，争强好胜，不守校规，完全不像昔日宁静谦逊的洛肯少年。生命中长期缺失的男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他，使他产生出神经质的自我考验的欲望，他折磨自己的身体，以肉体的痛苦修炼精神的忍耐，他越感到自己的柔弱善良，就越希望得到希腊英雄般的神力。其实，连他这种神经质的自我折磨，也带有一种女性歇斯底里的气质，正因为如此，他才更渴望像个真正的威猛男儿。

宗教是这个反叛少年的第二个目标。他热爱文学，熟知古代英雄不合道德规范的悲剧故事，倾心于从暴烈到澄明的歌德的那片天空，享用席勒的睿智，拜伦的激情，和莎士比亚的壮美。文学告诉他生之伟大与人之独特，从而使他对基督教的热情渐渐淡化，对所谓上帝、灵魂不死、彼岸等教义产生怀疑。上帝禁绝了思考，上帝代表着粗鲁专横的强权，强加给人们以所谓的原罪，因而良心上的忏悔是不必要的，人生的经验与宗教的教条是两码事。总之，与家族传统对立，他决定将来不再献身于宗教了。

1864年，尼采从普福塔中学毕业，来到波恩大学注册学习哲学与神学。他在这里热心于社交，自由探索的大学生活更使他远离了路德派宗教信仰。第二年四月，他回到瑙姆堡与母亲、妹妹共度团聚时，拒绝按照传统仪式领受复活节圣餐，甚至深爱他的母亲也不能够使他有稍许妥协。

年轻时的岁月似乎总可以分一些出来，奢侈地耗费在饮酒作乐的放纵生活中。尼采在波恩大学一度热心于交友，和一大帮普福塔中学的校友们纵情享受，把过剩的精力慷慨虚掷。

人群中原来最寂寞，风流云散时才痛感内心的空荡，不久尼采就又回到了惯常的孤单中。其实只有这时，生命才倍显充盈，孤单却不孤独。他钟爱寒夜孤灯下诵读悲剧诗篇的古今同情，也沉湎于黑白琴键上即兴演奏时的个性张扬，素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是他古代的先驱，瓦格纳则是现代最令他神清气畅的艺术家。

尼采原想在莱茵河畔过一种无忧无虑的“正常的”大学生的生活，但这一企图以失败而告终。而在莱比锡，他作为一个离群索居者，更加专心于自己的研究，回到了他所喜欢的生活方式上来。宁可离群索居，而又不失傲气。不久，他就在导师李奇尔的指导下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成了一名合格的语文学家。李奇尔希望成立一个语文学协会，得到了尼采的响应。他中学时代就渴望成立“日尔曼尼亚”的想法，现在在大学的天地里又变成了现实。没有多久，尼采就能够在大学的一个小范围里授课了。1866年，他第一次（后来还进行过多次）开讲梅格拉的泰奥格尼斯的诗作新版本。讲演很成功，在此事的激励之下，尼采把论泰奥格尼斯的著作送李奇尔过目，受

是真理，哪怕这真理是痛苦的、可怕的。

最后尼采对妹妹说：“人生的道路就有这样的不同，如果你祈求灵魂的安宁与幸福，就去信仰吧；如果你要做一个真理的追求者，就得去探索！”

显然，尼采本人是坚定不移地走探索者的道路，决不会成为一个盲从的信仰者，即使他早已经知道走这条路的艰险。这就注定他今后一生要饱受种种常人不堪忍受的磨难。

大学的第一年就要过去了。尼采已经决定离开波恩，转学到莱比锡大学。直接的原因是他的导师李奇契尔教授要去莱比锡大学任教，他不想离开这位学业上的导师，准备随导师一同去那里。

李奇尔之所以要离开波恩大学，是因为他跟另一个学术带头人扬的矛盾很大，彼此的激烈争吵几乎成了大学里人人皆知的丑闻。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李奇尔教授要去莱比锡另打码头。

跟随他而去的学生尼采，离开波恩的深层原因同样是人际关系问题。他来这里整整一年，竟没有结交上一个知心朋友。在小学有宾德和克鲁格，在中学有杜森和戈斯多夫，而在波恩什么人也没有。越是离群索居的人，越是需要一两个知心密友。尼采在大学的第一年感受的是一片友谊的沙漠。

尼采坐船离开了生活一年的波恩。这是他临离开时的心境：“一切都干涉我，我无法有效地主宰周围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对于科学无所作为，对于生活无所事事，只是以各种谬误充塞自己，想到这些，我感到心情沉重。轮船驶来，载我离去。在潮湿阴暗的夜色中，我一直站在驾驶台上，注视着那些勾勒出波恩城河岸的小灯渐渐消失，一切都给我一种逃亡的感觉。”

尼采一来到莱比锡就马上去莱比锡大学注册。他来的这天正好是学校的校庆日，校长正在向学生们训话，他告诉学生们，在一百年前的今天，歌德曾经和他们的前辈们一起在这里注过册。“天才自有其各自的道路，”这位谨慎的校长随即补充说：“沿着这些道路走是危险的。歌德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读书时代，你们不要以他为榜样。”“嗨！嗨！”青年人欢快地高呼，被人群淹没了的尼采恰好在一个纪念日到达莱比锡，这种巧合使他感到十分快活。

他烧掉了一些夹在作业本里的诗，重新投入学习，并训练自己以极其严密的方法研究语言学。可是，唉，厌倦不久就卷土重来。他害怕波恩那一年的情形重演，他的书信和笔记里又写满了大段大段相同的抱怨。好在过了不长时间发生了一件解救他灵魂的大事，从而结束了这些抱怨。他在书摊上偶而看到一本书，这是当时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亚瑟·叔本华所写的一部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看了几页，就被那文章的风格、美妙的词句所感染。他写道：“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灵在对我悄悄耳语：‘带上那本书回家去吧。’刚跨进房门我就打开这本这样得来的宝贝，并渐渐感受到那种充满激情而又极其忧郁的天才之强大力量。”

这本书的序异常丰富，其中包括那位被忽视的作者在间隔较长的时间里分别为1818年、1844年和1859年三个版本所写的三篇序。这些序文傲慢而尖刻，但是没有丝毫焦虑不安，它们富于深刻的思想和辛辣的讽刺，呈现出歌德诗歌的抒情风格与俾斯麦敏锐的写实主义相结合的倾向，它们具有那种在德国文学中罕见的典雅而富于韵律的美。尼采被书中的高尚气质、艺术情感以及纯粹的自由精神打动了。

在其后的两个星期中，他一直陷于对叔本华哲学的反复阅读和思考。这个狂傲而不幸的人，这个被家庭、学院抛弃而他以更激烈的语言和更彻底的方式疏离社会的

人,这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却不放过任何机会抨击德国,他的一切都如磁石般吸引着尼采。

叔本华是这悲惨世界的代言人,而尼采在他的书中也观照出内心忧郁的本质,在一段时间内,他与要好的朋友一起研读叔本华哲学,并放弃了生活中的享乐,节衣缩食,律己甚严,以至于不许自己每天睡眠超过四个小时。

其实叔本华这种阴沉的基调一直存在于尼采心中,即便他以后否定了叔本华的隐忍放弃,而把悲观主义宏扬为悲剧英雄主义,但是哲学家的平静心绪始终与他无缘。也同叔本华一样,尼采始终认为音乐是最有哲学深度的艺术门类,音乐解放精神,为思想添上双翼,“抽象概念的灰色苍穹如同被闪电划破;电光明亮足以使万物纤毫毕露;伟大的问题伸手可触;宛如凌绝顶而世界一览无遗。”

尼采是个天生的布道者。在他的宣传下,妹妹伊丽莎白、戈斯多夫、杜森都成了叔本华哲学的信仰者。这位叔本华迷几乎可以在一切地方看到他所敬仰的大师的踪迹。当朗格的《唯物主义史》出版时,尼采十分兴奋,认为它是为叔本华哲学张目的,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实朗格在这书中宣扬的是康德哲学,一种新康德主义,同叔本华的东西区别很大。

这一年复活节尼采回到瑙姆堡,他的心中充满欢乐。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的心境:“有三件事成了我的安慰,多么难得的安慰啊!这就是叔本华、舒曼的音乐以及孤独的散步。”

尼采从叔本华的哲学中获得一种类似佛教的顿悟。虽然在大约十年以后,他开始与叔本华彻底分手和决裂,把叔本华视为最大的颓废者,但直到他有理智生活的最后两年,在谈到叔本华时,他仍然承认叔本华是自己的先驱,自己是他的继承者:“我的先驱是叔本华。我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当然,他同时又是彻底的批判者。他对于叔本华的批判是一种扬弃,而不是简单的抛弃。原因就是,在骨子里,他和这位悲观主义大师有着无法分割的同一性。

由于叔本华,原先枯燥单调的语言学课程再也不是不可忍受的了。尼采以愉快的心情投入到这种专门的研究活动之中。

李奇尔教授向他的学生提出一个建议:成立一个由爱好语言学的学生组成的语言学研究会,以此来推动这一方面的学术活动的开展。尼采积极响应导师的号召,参加了筹备工作。

1866年初,语言学研究会成立,共有11名成员。在尼采的感觉中,这个组织有些类似他在中学自发建立的“日耳曼尼亚”,是可以视为由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进行自由精神活动的场所。

尼采的书斋生活在语言学与哲学之中消磨,他是李奇尔教授非常赏识的一个学生,然而又像被叔本华勾走了魂一样迷恋他的哲学。当他准备攻读博士课程时,来自军方的一纸命令将这个文弱书生招入军队。

由于尼采骑马出了事故,军训提前结束了。他前胸受伤,痊愈很慢。因此,直到服役期满,尼采都在休病假。现存一帧摄于那时的照片,他满身戎装,手握一柄出鞘的军刀,这模样可能很适合当时的照像习俗。这是一位乔装打扮的学者的留影。尼采可以利用他的病假去学习紧张的语文学专业。1868年秋,他胸有成竹地又回到莱比锡度过了最后一个学期。他的学业已近结束,然而李奇尔的嘉许仍然惠顾于他,他展望将来有一个教学生涯。正如他对罗德所承认的,他对此没有任何“奢望”。当然,

他视在大学授课的前程为一种能使自己有闲暇进行研究的生活,也会在政治上、社会上得到保障。

尼采不仅理所当然地抱有这种希望,而且比他预期的时间来得更加迅速。1868年至1869年的冬季,当他计划同罗德一起到巴黎旅行的当儿,在李奇尔的倡导下,他被推荐到巴塞尔大学担任古典语文学副教授。

1869年2月,在尚未取得博士头衔之时,他就接到了去巴塞尔大学就职的正式聘书。于是,莱比锡大学据尼采已发表的著述,未经其他考试就授予他博士头衔,同时还免去了去巴塞尔大学任教资格的种种手续。这样,尼采以34岁半的年龄,在大学学习过后未经任何过渡就出任了副教授之职,一年之后转为正教授。

初识瓦格纳

1869年4月,尼采来到巴塞尔大学,就任语言学副教授之职。巴塞尔是瑞士的城市,尼采很自然地加入了瑞士国籍,成为一个瑞士公民,他对于此点没有什么不安。在他的印象中,他既属于德国,也属于整个世界。他的先祖就是一个斯拉夫民族的波兰人。

正像以前每到一个新环境一样,开始时尼采努力适应新情况,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宴请、舞会、拜访同事,但不久他就感到厌烦,满目所见都是无聊和庸俗。他对同事的态度渐渐冷淡了下来,别人自然对他也热乎不起来。于是他又把自己放在一个孤独的境况之中。

到巴塞尔不久,在给洛德的信中反映出他此时的心绪:“除了您以外我再没有更亲近的人可以谈心了,我生活在一片孤独的灰云里,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我无法拒绝人情应酬的压力,不得已在会场上和形形色色的手拉在一起。在这样的聚会里,我总是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而找不到自己的知音。这些人称呼我教授,他们自己也被这头衔冲昏了,他们以为我是太阳底下最快乐的人。”

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尼采常常一个人去附近的峡谷和森林散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他的心情稍稍感到好一些。童年在乡村度过的那一段美好幸福的时光浮现在回忆中,成为对孤寂生活的一种抚慰。

5月2日日,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博物馆主厅作了就职演讲,题目是《荷马与古典语言学》。在这里,他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以后一直坚持和努力深入的基本学术思想:语言学不是一门纯科学,而是与艺术紧密交织重叠在一起的。它的新颖性给听众留下了印象,反响是热烈的,这次演讲奠定了他在巴塞尔大学的教师地位。尼采每星期有六次课,关于古希腊文,但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并不特别多。

作为教师,尼采在巴塞尔入学是受到欢迎和尊重的。一年后他被提升为正教授,以后又给他加了薪水。1872年由于他拒绝受聘到另一所大学,作为回报,巴塞尔大学又把他的薪水提高到四千法郎。

年轻的尼采教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人们通常会羡慕的地位和前程。如果他安于现状,循此渐进,就会有一个安稳、舒适、受人尊敬的生活条件,在学术界也会像他的恩师那样成为这个专业的权威——李奇里契尔教授在给巴塞尔入学的推荐信中所预言的那样。

但尼采没有顺应这个预言,他的天性使他注定要走另一条道路,那是充满孤独、

坎坷、困苦的道路。他从来不是一个肯安分的人。

对尼采来说,这期间比较重要的友谊是同比他年长 31 岁的理查·瓦格纳的交往。当时瓦格纳住在卢塞恩·的特里普森,不久有了同瓦格纳重叙友情的机会。1869 年,尼采到瓦格纳家中做客,当时为瓦格纳操持这个非同寻常家务的是考西玛。考西玛·冯·比洛夫是李斯特的女儿,是瓦格纳一个任乐队指挥的朋友之妻,尚未与瓦格纳成亲。1866 年,瓦格纳的前妻去世,为躲避经济、政治及社会诸方面的困境(这种情形曾发生过多)由慕尼黑迁居瑞士。紧随其后,考西玛带着她的孩子达尼拉和布兰迪内·冯·比洛夫,又带上她与瓦格纳所生的伊佐尔德来到瑞士。1867 年,他们二人又生下了女儿埃娃,两年之后又生下儿子齐格弗里德。

理查·瓦格纳和考西玛对这位年轻的学者颇有好感。双方很快密切起来。没有多久,尼采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而且可以长期使用两个房间,随时随地进进出出,留居悉听尊便。在这里,他不只是接近了这位备受尊敬的音乐天才,而且也在这个非小市民家庭气氛中感到十分惬意。早在学生时代,尼采就崇拜瓦格纳的音乐作品,这时则对瓦格纳的为人也很醉心。

尼采被这种友谊弄得着了迷。他自童年到现在第一次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他陶醉了。瓦格纳的性格有着阴暗的一面:专横跋扈,自私自利,肆无忌惮,挥金如土,可尼采则没有觉察。

这种宾至如归的幸运,对尼采来说持续到了 1872 年的 4 月,也就是说将近三年时光。后来,瓦格纳迁居拜罗伊特。尼采于同年 5 月 22 日为参加音乐节大剧场的奠基仪式才又在那里拜访了瓦格纳。这种相处在 1870 年 8 月至 10 月才告中断。这短短几年却是尼采生命中弥足珍贵的记忆,他分享瓦格纳儿子出生的喜悦,还应邀在瓦格纳家度过了他在巴塞尔的第一个圣诞节,参加了拜律特剧院的奠基仪式,在音乐与哲学的欣赏中共同探讨艺术与人生,愉快的时光,可爱的人们,这样的快乐为什么总是不长久呢?

思想的凝聚

在对希腊文化和瓦格纳越来越深厚的情感中,尼采构思着他的第一部著作,关于悲剧艺术的古代辉煌与现代重生。对古籍的分析加深了他对现代文化的做作虚伪的反感,而他选择的领域是德国人相当熟稔的希腊文化。18 世纪以来,相继出土的古代遗址备受关注,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开启了哲学家与艺术家研究美学问题的新视野,歌德、席勒均以人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的和谐来解说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尼采则另辟蹊径,指出希腊人看清了人生的悲剧意义,其内心的矛盾冲突激荡不已,方才产生了作为调和的艺术。

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与酒神的二元性相关的。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是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时是预言之神,支配着内心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精神体现在春日照临、万物欣欣向荣的激情之中,物我两忘、沉醉狂欢的境界。日神如梦,酒神如醉,梦与醉的艺术世界结合起来,产生了阿提卡的悲剧作品。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日神与酒神的美进行对比又对等视之。“像玫瑰花从有刺的灌木丛里生长开放一样”,希腊民族如此敏感,欲望又如此强烈,因而特别容易痛苦,酒神的护伴西勒诺斯对找寻世间最好的东西的国王说,那最好的东西是世间众

生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而次好的就是“尽快去死”。因此，唯有在日神精神的明丽阳光下，人才会渴望生存下去，像荷马的英雄一样悲叹与生命的分离。静穆柔和的梦境，时刻保持着美丽光辉的尊严，日神本身被看作个体化原理的神圣形象，他的表情和目光向人们表现着外在的全部喜悦、智慧及美丽。日神文化体现为希腊的史诗、雕刻和绘画艺术，这完美的静观世界诞生于苍茫的宇宙，升起了一个幻觉般的新的世界，“它闪闪发光地飘浮在最纯净的幸福之中，飘浮在没有痛苦的、远看一片光明的静观之中”。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对古籍深入钻研后的一部学术著作，文学味十足，毫无学究气息，其想象力与洞察力被20世纪英国古典主义学者称为“整整一代的学术所望尘莫及之作”。然而当时一般古典学者对此书都表现冷淡，其中第二部分大谈悲剧的重生与瓦格纳的音乐，招来许多人不满意，标新立异、才高招嫉的现象再一次出现于尼采身上。一时间，他陷于孤立被动的局面，虽然有朋友为他出面辩护，哲学界却敌意难消，尼采的学生甚至也被动员不来上课。表现最兴奋的则是瓦格纳自己，尼采把艺术的理想寄托在他的身上，认为他的歌剧是德国文化的希望，《悲剧的诞生》的现实意义即在于此，所以，瓦格纳在看到这部书后，在给尼采的信中高度评价这部书：“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像这样好的书，简直伟大极了！”

在《悲剧的诞生》的基础上，循着对于科学 and 知识问题的思路，尼采深入探讨了哲学的功能、性质和特点。

尼采认为，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对知识冲动进行约束和控制。自苏格拉底以来，人类求知的欲望形成了一股狂潮，知识被滥用为可以解决一切、压倒一切的东西，由此给人类带来错觉和灾难。科学不惜任何代价冲向一切可认识之物，而哲学思维总是立足于对事物本质和核心的认识。它说：“只有这才是伟大的，只有这才值得认识！”由此来提升人类超越自身盲目无羁的求知欲，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尼采并不一般地反对科学和知识，而只是在它们遮蔽了生命本能的情况下他说：“为了反对中世纪，历史和自然科学曾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反对信仰。我们现在用艺术来反对知识：回到生命！控制知识冲动！加强道德和美学本能！在我们看来，德意志精神将由此获得拯救，从而再次成为拯救者。”

哲学凭借什么来控制知识冲动？凭借它的体系中的艺术因素。一个哲学体系只是一个幻想，一个骗过知识冲动和仅仅暂时满足它一下的非真理；在这种满足中，哲学的价值与其说来自知识王国，不如说来自生命世界。生命意志利用哲学以达到更高形式的存在，哲学仅仅证明了幻想的必要性和艺术的必要性。

哲学的性质介乎艺术和科学之间。就目的和结果说，它是艺术；但它又与科学使用同一种手段——用概念表述。因此，哲学有时是科学，有时是艺术。

不仅如此，就哲学是超越经验的创造、神秘冲动的继续而言，它与宗教也有血缘关系。哲学同宗教一样，有着自我消费的功能，也就是可以在内部得到一种满足，而这在科学和艺术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哲学与这几种因素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对它们实行制约：它用艺术控制知识冲动，反对科学独断论，又用概念控制宗教的整体冲动，反对宗教造成的自然形象的混乱。

真理问题显然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尼采对此作了大量思考，而且有许多非同一般的见解。在尼采看来，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就是根本没有真理这回事。世界作为一个盲目的意志的体现，人类根本无法参透它。存在的形而上学意义、伦理意义和美学意

义全部都是不能证明的。我们平素所说的真理,根本不是指的这个。

我们通常说的真理,只不过是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或忘掉其为谎言的谎言。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人类关系,或是共同的约定,或是通行的隐喻,在长期存在之后,由于无意识和健忘,人们把它们当成了真理。它们与人类其它的幻想和谎言没有任何实质的不同。

但人总是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寻求世界真理的欲望,相信自己最后总会找到真理。其实他渴望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对真理的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可以给他带来的快乐。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自己拥有真理,就不可能有纯洁和高尚的生活,因此他需要信仰真理。人的真理冲动具有明显的道德因素或起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理 and 知识冲动,实际上只有对真理信仰的冲动。尼采指出,人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因为他是乐天的,作为个体他具有必然毁灭的命运,而他竭力逃避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世界的真谛,而他却深信通过认识能够达到真理;但认识不过是使用最称心的隐喻,是一种不再被认为是仿制的仿制,它无法达到真实的深处。他需要对真理的信仰;没有这个,就既不会有社会,也不会有文化。

人类一切信以为真的东西,都是幻想,都是谎言,不过在这些幻想和谎言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尼采对艺术特别推崇,尽管它也是一种幻想,因为艺术家是把幻想当做幻想,而不是把幻想误认为真理。艺术家仿佛是对睡梦中的人说:“让他继续把梦做下去吧!不要去叫醒他!”因为人既然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得继续活下去。

然而哲学却把幻想当做真理,充满真理感的哲学家仿佛在对睡梦中的人喊道:“快醒来吧,不要再做梦了!”其实当他相信自己是在唤醒沉睡者时,哲学家本人却在沉入更深的奇异睡眠中:他也许梦到了不朽或理念。而这不朽或理念,恰恰与人的最根本的真实——人终有一死——相反。

视幻想为幻想,视谎言为谎言,这才是唯一的真实;而这,只有当人处于酒神状态,以悲剧来观照人生时,才可能做到。只有把整个世界都当做一个幻想来思考的人,才有资格不带任何愿望和冲动看待它。尼采的真理观同他的整个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通观尼采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与写《悲剧的诞生》的时候相比,深入了许多。有不少是属于自己独创性的见解。当然,这种研究也继续发挥了以前的若干基本思想,如酒神意识,反科学主义等等。不过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就是对于艺术的态度。在这一时期,如同以前一样,尼采仍然相信,艺术是体现了生命本质的活动,是人唯一的形而上的慰藉。

1872年,作为尼采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不仅在于他在精神上开始求变、求新,完全跳出了语言学专业的束缚,还在于由此开始,他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了。此外在瓦格纳离开托里普森后,尼采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5月22日,尼采出席了拜洛特举行的奠基仪式。在这个活动中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一个新朋友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玛尔维达五十多岁,也是瓦格纳的崇拜者。7月,瓦格纳的《特立斯坦》在慕尼黑公演,尼采去了,再次同玛尔维达见面,一起度过愉快的几天。通过深入的交谈,他们成了知心的朋友。玛尔维达是尼采唯一的女性挚友,像大姐姐那样关心和帮助着他。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尼采去世。

10月,尼采休假后回到巴塞尔。这时他同大学的同事奥弗贝克和罗蒙特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了。在给洛德的信中他写道:“奥弗贝克和罗蒙特是我生活和思想的同

伴,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再感到忧伤和愤怒。奥弗贝克是极其严肃和没有偏见的哲学家,也是最单纯可亲的人。他有那种激进的勇气,而一旦人们缺乏这一点,我就无法同他友好相处。”

转眼到了1873年,尼采准备写他的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系列论著的第一部,材料都弄得差不多了,作了大量笔记。5月初,正要开始动笔写的时候,突然身体变得很坏:头痛剧烈发作、眼睛不能经受任何光线,几乎成了瞎子。他完全无法工作。

在众口一辞的颂歌声中,尼采写作了著名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由四篇很长的论文组成,对现代德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尖刻的批评,矛头直指向普法战争以来德国人当中弥漫的那种粗俗的傲慢。

第一篇《耶稣传》曾经传诵一时,作者施特劳斯以因果关系来研究圣经故事,由其中的逻辑矛盾说明,耶稣的神性并不可靠,他的所谓独特性、完满性、绝对性等说法也不成立,《耶稣传》历史地考证圣经文书,不再赋予它神化色彩,在基督教国家中引起了轰动。然而岁月流逝,昔日活跃的思想纳入了寻常的轨道,沸腾的血温凉了,1872年,施特劳斯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旧信仰与新信仰》,宣称要建立一种积极的有教养的人的世界观,提出“以艺术代宗教”,通过艺术欣赏来获得感化与提高,为此他用很大的篇幅向人推介“我国的伟大诗人”、“我国的伟大音乐家”。在尼采看来,斯特劳斯的广泛影响在教育上造成了平庸化,以庸俗化为代价拉近了艺术与人生的距离,在德国人心中造成了一种呆笨的自以为是,扼杀了活力洋溢的思想,德国的教育“无意义、无实体、无目的”,是一种纯粹的所谓“公共舆论”。

这部书的第二部分《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之不合时宜在于它“指明了我们科学活动方式的危险性”,现时代的非人化齿轮装置、工人的非人格化、劳动分工毒害了生命的因素,而德国知识界仍然埋头于烦琐的历史文物当中,兢兢业业地证明每个时代所谓固有的权利和条件,以便为这个现实世界将来要面临的审判做好准备。但是,历史的研究应当回应挑战,尽管让弱者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随时间流逝如灰飞烟灭去吧,却要促进强者的发展和人格的升华。

第三篇《教育家叔本华》把矛头对准了各所国立大学,叔本华的遭遇证明了一点,哲学的发展一贯是在学院高墙以外进行的,而国立大学支持低劣的哲学家已成习惯,御用的大学教授只知致力于低劣的人生价值的灌输。在这种管理机构之下,学者只剩下了政治狂热症患者和形形色色的写作匠,在呼吁提高群众整体水平的同时反而降低了个人的价值。

《瓦格纳在拜律特》是这本书中最富激情的部分。尼采分析现代文化的危机,指出人类的语言因为“远离那种它本来在完全的质朴性中能够加以满足的强烈感情冲动”,而变得成为一种“自为的暴力”,没有人能朴素地说话,人们成了词语的奴隶,尤其在现代教育体制下,很少有人能保持住自己的个性。音乐与人生的关系不但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关系,而且是以完美的听觉世界对全部视觉世界的关系,现代人的生活贫乏而枯竭,外表却五光十色。

尼采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曾在1870年作为瑞士公民参加了救护工作,结果染上赤痢,很久才恢复过来,失眠症、眼疾、头痛和胃病,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造成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劳累,他在巴塞尔大学的课业很繁重,每周要在大学和附属高中共代课13个小时,还要忙于准备新的讲座,以及从事著述。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孤独,他有一些朋友,可与切磋思想,讨论问题。可是他没有爱情的阳光,他的目光太深邃了,似乎没有女子可以照亮它。他没有财产,没有健康,没有经验,更没有勇

气去承受一个女人。他爱过，可是失败了，对方像是森林中受惊的小鹿一样逃离了这个其实更纤细的心灵。

1876年，尼采在病中口述完成了关于瓦格纳的论文，之后就去拜律特去会见瓦格纳，参加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彩排。由于眼疾，他只能闭目欣赏，结果极为失望，整个剧都充满了基督教的气息，一部初创时具有革命精神的剧作成了作者费尽心机制造戏剧性效果的成功典型。彩排还没有完，他就退出了，独自徘徊在幽静的森林中，承受着偶像破灭的打击，构思着批判瓦格纳的纲要，几天后，他又回到了拜律特，这里已经成了瓦格纳新崇拜者的圣地，皇家贵族和悠闲的富人是拜律特主人的座上宾，在尼采看来，这些人有着同样的逻辑：“谁让我们躺倒，谁就是强大的；谁把我们举起来，谁就是神圣的；谁让我们忐忑不安，谁就是深刻的。”四年前，拜律特奠基礼时，尼采参加了，一些真正理解和喜爱瓦格纳的人参加了，那时的参加者是不合时宜者，四年后，拜律特光彩焕发，向全欧洲的有产阶级敞开大门，而尼采重又做了一回不合时宜者，他从拜律特逃走了，一个字也没有留给瓦格纳。

尼采随后获准到意大利去休病假。在索伦托，他又碰到了瓦格纳，后者已经是德国乐坛的大师了，津津乐道于他正在创作的新剧《帕西法耳》，还表现出对宗教活动的积极热情。作曲家已经衰老了，叛逆的齐格飞换成了圣徒帕西法耳，正如年轻时的革命精神一变而成为基督徒的救赎情怀，一系列激烈反犹的言论表明他的思想已经中毒很深，而尼采方才在彻骨的心痛中清除了一厢情愿的幻想，向着属于自己的巅峰进发。

在意大利期间，尼采完成了《人性的，太人性的》，尼采称这部书是“危机的里程碑”，也是“无情自我驯化的纪念碑”，开始摆脱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从而迈出了走向自我的重要一步。这书正好在伏尔泰逝世百年的纪念日发行，尼采认为这不仅仅是个巧合——伏尔泰是一个精神贵族，而他本人也是。从此之后，这种精神贵族的语言态度就成了尼采作品的一大特色。

正是从《人性的，太人性的》开始，尼采达到他的思想的完全成熟期。他让自己最终从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瓦格纳的美学、基督教的信条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上的充分自由和完全独立。

此后，他几乎在每部重要著作里都要批判瓦格纳，在精神崩溃前夕还发表了两本专门与瓦格纳为敌的小册子《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对瓦格纳》。他称瓦格纳是解剖现代病的“难得案例”，瓦格纳的艺术是颓废的、病态的，而尼采自认为是这个时代的颓废产儿，因此对瓦格纳的批判也是他的“自我克服”。尼采后来写道：“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恢复健康，瓦格纳是我唯一的病痛。”

当尼采寄给拜律特两册《人性的，太人性的》时，他也收到了瓦格纳的一本精美的《帕西法耳》，两本书交相互赠，像是两柄剑在空中交锋，发出不祥的响声。尼采与瓦格纳自此绝交，在瓦格纳，这不过是一个忠实门徒的消失，在尼采，却不仅与瓦格纳一刀两断，而且由此看穿了名利，看到了自己的天赋绝不止是在巴塞尔做一个兢兢业业、皓首穷经的学究。属于聪明人的路，永远坎坷而寂寞，但是尼采已经走出偶像的阴影，他的王国在风光无限的峰顶。

1888年11月，已经遭到精神病侵袭的尼采在自传中还这样写道：“因为在这里忆及我生活中的某些安慰，我应该对那件给我带来最深刻、最可爱的欢乐的事情——即我和瓦格纳的亲密关系说句感激的话。我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姑且不论，但我根本无法把在托里普森的那段日子，那些充满信任、欢乐，闪耀着崇高的思想异彩的

时光——那些最深沉的幸福的时光从我的生活中抹去。我不知道在别人眼里瓦格纳是谁，但我们的天空中可从来没有过一丝阴云。”

这一时期，病毒无止无休。尼采不得不再再请假停止授课。由于结婚终成泡影，余下只有他曾提出过的第一条路了，即请辞巴塞尔的教职。另外，1878年夏，尼采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6月底，设在巴塞爾的家解体了，其妹去了瑙姆堡母亲那里，长期不能回来。1879年年初，尼采健康状况更加恶化。剧烈的头痛、眼痛和呕吐经常发作。这样，尼采在5月2日不得不向巴塞尔行政当局提出辞呈。六周之后宣布去职，大学以真诚的惋惜之情免去了他的职务。尽管困难很多，但人们仍对尼采取得的成就予以很高的评价，并每年发给他3000法郎的退休金。他在1878~1879年冬季学期做了最后两次授课，内容是《希腊的抒情诗人》和《柏拉图研究导论》。尼采先是携其妹到伯尔尼附近的布雷加滕宫旅行。不久，伊丽莎白又不得不回到母亲那里，由奥弗贝克住在苏黎世的岳母照顾他。

在生命中最暗淡的日子里，尼采完成了《漫游者及其影子》，第二个冬天，他的身体未有好转，但伴随着极度虚弱而来的愉快和灵性促成了《朝霞》的问世。在热那亚的海滩上，像安详而愉快的海兽在岩石间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尼采沐浴着海风，与海洋秘密地交谈。孤独是可怕的，而“我仍要重归于孤独，独与晴朗的天空，孤临开阔的海洋，周身绕经午后的阳光。”

南方明快亲切的阳光使《快乐的科学》同样语调温和，流露出生命之喜悦，在第三部分中，尼采以寓言的方式，借狂人之口宣告“上帝死了”。原来上帝早已毁灭，只是人们还不知道罢了。于是，狂人大清早提个灯笼跑进街市里，不住地嚷着：“我要找上帝，我要找上帝！”他的话引起了一片哄笑，不信神的人们喧笑着：他迷路了吧，还是他怕我们，藏起来了？狂人于是跳到人们中间，叫喊着：“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我们杀死了他！”可是这件可怕的事尚在途中，还没有到达人们的耳中，人们沉静着，望着他，于是狂人说，“我来得过早，我的时间还没有到。”

但是尼采的新人即将诞生，当尼采穿过瑞士西尔瓦波拉纳湖边宁静的林带，注视着兀立不语的高山岩石，在一张纸上写下“距离人与时间的彼岸6000尺”时，查拉图斯特拉的影子忽然像飞鸟一样掠过。不久之后，尼采爱上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士莎乐美，却不幸陷入了一场三角恋爱，最后莎乐美与他的朋友一起离开了罗马。为了追求莎乐美，尼采还与妹妹伊丽莎白发生了冲突，伊丽莎白不喜欢看到尼采的思想染上了莎乐美的影响，而尼采对她的骄傲自大同样不能容忍，两人一度中断通信联系。

清风了无痕

1882年冬，尼采独自一人来到热那亚附近的拉帕罗海湾。这年冬天，南方的阳光几乎不见踪影，霪雨霏霏，天气寒冷，他在海边的小饭店里居住，在大海的怒潮中夜不能寐，总之一切状况都与愿望相反，然而就在这“逆境”中产生了最伟大的作品。每天上午和下午，尼采都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漫步到可以看得见海的高山松林，漫步到静谧的海湾岬角，在孤独而悠长的路程中，他不时掏出笔记本，记录下来一闪即逝的灵感。

“孤独者的岁月悠悠过去，他的智慧与时俱增，终于因着过多的智慧而感到痛苦。

我这殷切的爱泛滥如洪流，下注于朝阳与落日：自寂静的高山与痛苦的风雷中，我的灵魂冲向溪谷。

“从高崖倾注之流的激响，我将以我的言辞投向深谷。”

1883年2月14日，尼采在极大的快慰中完成并誊好寄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得知瓦格纳已于前一日去世。

他离开意大利，到瑞士风光秀丽的西尔斯玛丽亚完成了第二卷书。秋天回到瑙姆堡，却发现妹妹伊丽莎白追随著名的反犹分子佛斯特，帮助他收集25万人签名的反犹请愿书，两人还准备结婚，并将去南美巴拉圭建设殖民地。在极为反感的情绪中他只呆了四周，就去尼斯过冬，最终在1884年冬天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全部四卷书的写作。这是一部杰作，尼采认为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它真正散发着高山冰雪之气，这是书中至尊，从无限光辉之源和幸福之源缓缓流溢出来。

然而，书的第一部分被推迟印刷，出版商正忙于交付大量的《圣歌集》，接着又要印许多反犹太人的小册子，至于第四卷，尼采只好自费印刷了40本，七本送了人，没有一个人肯称赞。像尼采说的，这真的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书，也是无人能读的书”，这世上没有什么人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了，他下定决心保持独立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他的身体状况使他相信那一刻就在不远的前方。于是他继续在瑞士和意大利之间游荡，在经历了查拉图斯特拉的袭击之后，他的使命就是要重估一切价值。他在尼斯安顿下来，构思写作《善与恶的彼岸》，这是对当时科学、艺术乃至政治的批判，指责基督教理想是奴性种族的产物，尼采自己提出了一套颇为奇异的道德体系。

这本书一印出就遭到了学者们的攻击，甚至他的朋友们也不能容忍他反对一切的狂热劲头：在空前的孤独和病痛中，他自知死期将至，反而在生命力极衰弱的一年间连续写成了《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和讽刺性自传《瞧！这人》在他的文稿中还留下大量散乱的格言，都是为尚在计划中的《强力意志》和《重估一切价值》做准备。

可是，偏偏是这些著述和有争议的《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对醉心尼采的信徒们，一直具有神奇的吸引力。因此，尼采如同荷尔德林，受到不少误解。如荷尔德林的崇拜者，就曾把他最后的诗作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启示。纯臆测的诠释在哲学上可能是合法的，但在描绘一幅生活图景时，则是要求严谨的。

他死于1900年8月25日，葬于洛肯镇墓地，埋在他父亲身边。

马克思

——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德国 1818~1883）

青少年时代

1818年5月5日,卡尔·亨利希·马克思生于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后改名亨利希·马克思,生于1782年,同一位荷兰女子罕丽·普列斯堡结婚,生育多名子女,只有卡尔·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菲亚、爱米利、路易莎存活。

卡尔·马克思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的智慧、他的无与伦比的天赋是他父亲的希望,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才能最终将用于造福人类的事业;他的母亲虽然对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也关怀备至,却完全被家务缠身,对于卡尔·马克思的成长来说,母亲只给了他一个温柔的怀抱、一个和蔼宁静温暖的家庭,而根本没有参与过儿子的思想斗争,只是有时不禁以一个母亲的心情为她的卡尔深思,想到假如他走上了人生的正轨后,他的成就会有多大。后来,卡尔·马克思似乎同他母系的荷兰亲属,特别是同他的一位舅舅菲利浦斯接近起来,这人在他生活困难的时刻曾经在物资上帮助过他。

应该说,卡尔·马克思继承犹太人的聪明、智慧、坚韧和荷兰人的勇敢、无畏、向上精神。有时候,就连马克思的父亲也怀着忧惧与期盼的矛盾心情注视着爱子不安于现状的灵魂。但遗憾的是他在卡尔刚满20岁几天后去世了。

中学生活曾经给予正在成长的马克思一些什么,就不清楚了。卡尔·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任何一个中学同学,而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所写的关于马克思的回忆。他相当早就在本城的中学毕了业;他的毕业证书上注明的日期是1835年8月25日。证书上照例地写着对这个有才华的青年的祝福,以及关于他的各科成绩的老一套的考语。但是,毕业证书上特别指出,卡尔·马克思能很好地翻译和解释古典作品中最艰深的

